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al Basis and Academic Summary of Virtue Capital Research

Yuejin Zhang Hongjuan Jia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Taizhou College, Taizhou, Jiangsu, 2253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traditional culture conception, even if enterprise virtue capital has not been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of mainstream science, it has always been the attention of social theorists and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on corporate moral capital or related topics i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a and abroad, and the writings are quite abunda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fully tap the practical efficiency of virtue capital, and exploit the directing and pushing role of virtue capital in improving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enhance the business vitality and innovation power, to better form new ideas and new thinking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to help promote the practical benefits and value-added tension of social economic activities.

Keywords

virtue capit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business value

企业德性资本研究的现实基础及成果综述

张跃进 江洪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中国·江苏·泰州 225300

摘要

在儒家传统文化理念的熏陶和影响下,企业德性资本即便没有成为显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却历来也受到社会理论家和管理实务者的关注和重视,古今中外围绕企业德性资本或相关主题的研究较多,著述颇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充分挖掘企业德性资本的现实效能、发挥德性资本在提升企业绩效与增强组织韧性等方面的指引和推动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经营活力和创新动力,有利于更好地形成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理念和新思维,从而助力提升社会经济活动的现实效益和增值张力。

关键词

德性资本; 企业管理; 商业价值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企业在人力、物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投入也呈现出了指数级别的增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特别是在形成了新发展格局之后,企业传统生产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基于绩效提升的企业德性资本培育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SJA24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20年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基于OBE理念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JG12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跃进(1981-),男,中国江苏南通人,硕士,副教授,从事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要素的投入效益已经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性提升,并且企业经营过程中时常出现经济价值偏重化的倾向,这就需要探讨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的动力和新价值。企业德性资本的培育和挖掘成为企业治理提升理论研究中的新课题。

2 企业德性资本的历史沿革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商业道​​义中,一直比较崇尚“道德”“德行”或者“伦理”等对个人及群体行为的理性约束和心理规范,并形成相应的社会舆论范畴和心理契约环境。吕不韦在《察今》之中有言:“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中国古代的太史公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直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专门作《货殖列传》,记录彼时成功的工商人士发财致富后基于个人德性的弘扬而服务乡梓、回报国家的崇高事迹。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的梁漱溟先生

曾说过中国文明早熟，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有资本主义了，自战国以来，封建制瓦解，人们在皇权之下平等，私人产权制度确立，在此制度框架下的经济当然是私人产权基础上的市场体制。有这样的市场体制基础及其社会交易实践，就应该有与之对应的精神基础和行为规范^[1]。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制体系以及社会伦理道德框架中，以儒家为主、道家法家为辅，后来又引入佛教伦理规范的商业伦理体系对彼时的社会生产以及商业交易行为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引导和约束作用。中国古代的儒商群体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并且逐步得到发展壮大，并对中国古代朝代的更替轮换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所谓“儒商”，就是信奉以儒家伦理纲常为主的商业交易、社会合作活动的典范和规则并将其作为开展社会生产和经济合作的理念依据和实操基础^[2]。承袭儒家传统纲常理念的商业伦理并不排斥社会的商业现象以及从商阶层对于物质利益的崇拜和追求；依据儒家的商业伦理，所有的社会民众都可以在遵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赚钱规则的前提下谋取各自的经济利益，并从而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序健康发展。对于商业从业者来说，在交易过程中做到诚实守信、合规经营，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交易的参与者都想通过可预见性的商业诚信及其行为模式来确保交易的顺利完成和信誉的逐步累积。在传统封闭的熟人社会环境中，商业失信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甚至会给商业失信者带来致命的报复和打击。但是，在法治机制缺失、人治氛围浓厚的制度环境下，也难免会出现掌权者在商业领域主动寻租的社会现象，商人为生存计、为发展谋，有时不得不做出有违传统商业伦理道德的妥协苟且之举。一方面，有君子之风、品行高尚又能严于律己的儒商个体却不会选择主动与权力阶层进行勾结设租。另一方面，儒家伦理具有鲜明的财富价值观并对社会中的商人群体产生显性的影响，教导人们不应该把金钱等物质利益看做人生在世的唯一行为目的，而只应该是满足生活需求以及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手段。社会民众可以通过参与合法合理、符合商业伦理道德的交易、合作活动积累物质财富，但不能痴迷于物质的追求和拥有，不能对金钱等物质财富产生盲目的拜物教心理^[3]。人的真正价值不能以赚取或者拥有金钱财富多寡的标准来衡量，而应该以社会所认可的个人道德品性的高低为依据来考察。如前所述，个人的德性当然是不以财富为前提的，但富裕有财的人可以给德性更多的表现空间，可以利用自己的金钱财富为他人、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或者提升福祉，从而彰显自己的高尚品德和社会价值。正是在中国古代传统儒家商业伦理的约束下，传统商人阶层虽以金钱财富的获取作为自身的主业目的，但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却是节俭自律的，在面对社会需求时却是灵魂高尚的^[4]。孟子曾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即人有灵魂，在物质欲望之上还有精神。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都与

同时期的政治运动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性，每次经济领域中的大震荡都在政治运动中达到高潮。1720年8月，一度被民众视为香饽饽的南海公司股票价格崩盘，到同年12月南海公司的股票已经如同废纸，价格再低也没人买了。为了解决南海公司诱导的社会金融危机，同时向社会民众还原整个事件的真相，英国国会着手调查南海公司股票崩盘的起因和经过，并最终查明主要是南海公司董事同会议员的行贿受贿行为以及南海公司对外发布虚假信息共同酿成了此次波及面广、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即南海公司的董事高管以及时任的部分英国政府官员因其失信丧德行为而在此次事件中难辞其咎。《1719年皇家交易所及伦敦保险公司法令》（别称《泡沫法令》）是为了维持南海公司的股价泡沫而由时任南海公司董事局总裁的布伦特游说政府通过的法案，意在禁止市场流通未经政府批准之股票，从而为南海公司股价的继续上涨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个实际上由南海公司通过贿赂手段出台用以维持股价泡沫的《泡沫法令》最终却也加速了泡沫的破裂。在《泡沫法令》维持效力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英国股份公司的发展近乎停滞，而且该法令的长期有效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南海公司给当时英国的社会民众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心理阴影和现实损害，使得英国上下各个阶层都对股份公司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感和排斥感，而股份公司原本是可以成为社会资源有效组合方式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南海公司股价崩盘后，英国国会再也无法忍受公司在经营管理和股票交易过程中存在的失信和坑蒙欺诈行为，继而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成立公司为犯罪行为”。此举虽然在当时使得通过开办公司来运营商业项目的选择项不复存在，但是实质上却是以终止和消除商业交易中的丧德失信与交易欺诈行为为目的的^[5]。

在近乎300年后的2001年12月，美国最大能源公司之一的安然公司突然申请破产保护，此后美国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丑闻不断，特别是2002年6月的世界通信公司会计丑闻事件，“彻底打击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美国国会报告，2002年）。2002年7月2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萨班斯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奥克斯利联合提出的《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又称《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国会参众两院最终通过。这是一部美国立法机构根据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等财务欺诈事件破产暴露出来的公司和证券监管问题所立的监管法规，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作出大幅修订，在公司治理、会计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该法案开启了美国企业对商业伦理道德进行深刻反思的时代，也引发了公司治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德性资本主义的大辩论。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框架内，理性的经济人在经营管理企业的过程中要不要将“商业德性”作为自身的行为参照和价值指南？企业在面临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时能不能将自身受制于

“商业德性”的约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密尔顿·弗里德曼明确表示反对企业承担任何形式的社会责任,他认为商业行为与道德追求无关,因为商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促进社会福利是政治机构的主要任务,如果企业履行所谓的社会责任,那是在履行政府才该履行的职能。在游戏规则(公开的、自由的、没有诡计与欺诈的竞争)范围内,为增加利润而运用资源、开展经营活动,为社会提供更多有用的产品和服务就是其最大的社会责任;从企业发展的本源或者一个企业创立的初衷来讲,也就不应该有什么社会责任问题。企业应该以经营活动的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因为只有赚钱的企业才是具有德性的成功企业,对于利润最大化的终极追求才是商业企业运作的行为逻辑与理性支撑^[6]。但是,商业企业组织真的可以只要唯利是图而完全不顾其他吗?或者说如果商业企业只是纯粹地以商业利润最大化作为自身的唯一行动目标,那么这个目标能否在真正意义上予以实现呢?著名学者威廉·葛里德在其畅销书《资本主义的灵魂》中明确提出了商业企业到底“要不要与能不能”履行道德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的老问题,并给出了十分肯定的回答。葛里德完全不赞同弗里德曼有关企业创设目的及社会责任承担的理论观点,并进行了有力的辩驳。商业企业将经营利润最大化作为自身的行动目标已经获得了社会民众的高度认可并得到了包括人力、物质、技术等在内的多方面社会资源的投入支持;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执法与消费反馈等途径为商业企业开展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社会民众通过不同的投资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为体量庞大、数量众多的商业企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资金支持和消费保障;商业企业特别是大型的上市公司,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以及民众的日常生存条件都产生了不容忽略重大影响。不管是出于对社会给予企业发展提供支持的回报,还是基于企业的社会影响已经大到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商业企业必须就包括社会责任在内的德性义务的履行承担相匹配的责任。如果商业企业不能通过履行德性义务而形成并积攒必要的“德性资本”的话,企业将难以获得足以保障其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所需的内部动力与环境支持的。霍南德与冯切在其新书《最重要的是什么》中,通过对企业经营的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比较分析,认为企业必须将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交易外在性”或“业务外部效应”,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予以自行消化或者吸收,以尽可能降低商业活动对企业外部社会环境造成的潜在或现实不利影响,从而对弗里德曼主张的唯利是图式“理性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企业如将该自行承担的个体经营成本外推给社会来承担,或者企业对自身经营行为外部效应采取无动于衷或者消极处置的态度,这将是一种不讲德性、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这将是一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风险并最终无法持续经营的企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德性资本需求的日益提升,

企业经营过程中亦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德性资本培育和运用的实践形式。霍南德与冯切在其新书中描述了美国各类“企业社会责任协会”“人道生产协会”“全球绿色生产组织”等德性资本主义的新机制。

另外,华尔街投资机构也日益重视企业德性资本的培育和效能的发挥运用。华尔街资金庞大的多米尼和卡沃特投资基金专门投向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注重企业公平管理、追求经营德性价值的成长性企业。当然,有关企业德性资本培育的方式,不同的行业企业有各自独特的实践做法,如多伦多与纽约的创新投资公司倾向于以环保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的德性程度、旧金山的进步资产管理公司则注重考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状况,但均可用资本主义或者企业经营的内在逻辑来解释,即愿意通过承担德性义务责任进行德性资本培育的企业经营绩效要高于同行竞争企业,即企业的德性、德行已成为激烈市场竞争背景下企业新的竞争优势和经营利润来源。根据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在追求自身经营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同时,还要对包括股权持有者、内部员工、消费者、政府监管机构以及社会民众等在内的诸多社会主体负责,需要对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给予必要及时的关注和满足。当德性经营的收益与成本比要优于逃避社会责任情况下的收益与成本比时,追求德性、德行便成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自觉路径选择。

3 企业德性资本研究的当代背景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经济的发展由速度导向型转变为速度与质量同步兼顾型,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发展质量的内涵提升,由过去的“投资和生产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社会形势,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和价值创造理念日益影响到企业自身的业务发展规模和利润实现能力。在新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企业经营所需投入的资源类别和数量均较以往有着日益显著的差异^[7]。

为了满足企业日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在传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生产领域的同时,企业应该加大对“德性”资本的培育力度并努力发挥“德性”资本在企业发展战略制定、日常业务运营以及组织改革创新等方面的引导和约束作用,以充分体现时代发展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现实要求。为了进一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繁荣,在贯彻人本理念的基础上探索基于绩效提升的企业德性资本培育机制和举措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德性”资本研究将为新时期企业经营改进和社会的后续繁荣发展提供建议和指引^[8]。同时,对企业“德性”资本的培养及利用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切实有效的实操方法对企业自身、企业投资者、消费者以及社会整体环境各

方面权益的保障和发展都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将为企业的良性、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推动力量。

4 企业德性资本研究的成果综述

梁捷(2006年)认为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社会里没有什么资本,道德是最重要的资本;在两千多年后的当代中国,社会里到处充斥着资本了,而道德仍然是最重要的资本。

金军哲(2008年)认为道德本来就不是什么空洞的说教,而是符合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东西。企业界流行一种新的资本理念——道德资本,是一个新课题。

疏唐泽(2010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和完善,职业道德也被普遍认同和关注,但是人们对于职业道德能否产生价值在认识上还存在分歧,特别是忽视了职业道德资本化的现实。

徐本华(2012年)认为道即路,指我们应走正路,可引申为行为的法则;德即得,道德合在一起,指走正路,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才不至于误入歧途。

章如庚(2013年)认为财富的资本来源于德性与智慧的积累,我们应该从古人的著作中去寻求德性与智慧。

谢玉进(2013年)认为追问企业道德资本的生成是“道德资本”理论与企业道德资本建设实际对接的重要环节,在“道德资本”研究中具有基础地位;探讨企业道德资本的生成,可以从“义”和“利”的辩证统一看企业道德资本生成的逻辑起点,从系统视角看企业道德资本生成的逻辑展开。

成中英、徐隽倬(2017年)认为,建立在德性能力上的领导力,尤其是政治领导力,是对《论语》中一直提倡的“智”“仁”“勇”等德性能力的发展和运用。儒家思想对人自我感觉、思维和意愿的深度结构性探究,带来了“智”“仁”“勇”等德性能力的产生。

卫旭华(2018年)认为,当领导避免采取违反德性原则的辱虐管理行为时,领导权力与地位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当领导频繁表现出辱虐管理行为时,领导的高权力并不能转化为高地位。

陈辉、王红梅(2019年)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对德性管理伦理的德性内容及养成机制加以重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通过构建个人私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体系,重建德性自修、家教训导、组织约束、道德楷模等德性养成机制,加强对组织管理者的道德约束和道德激励,才能使德性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丁志山(2019年)认为,组织在权变管理中,可能对组织德性的培育和已经形成的组织德性产生消极影响,组织的领导者培育组织德性要具备道德智慧,通过道德智慧培育组织德性,通过组织目标和道德管理引导组织德性。

靳凤林、冯磊(2020年)认为,资本阶层创新与冒险的

德性特质及其实现方式是其宪政制度发展的动力来源;劳动阶层权利与义务的价值观念及其实践路径是其宪政制度不断变革的重要纠错机制。正是这三大社会阶层激烈冲突又和谐共存辩证统一,塑造了近现代英国政治伦理的精神品相。

温照宏(2020年)认为,儒家“仁爱”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主导和核心地位,全面研究和把握儒家学说、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路径来源。

毛世英(2021年)认为,从儒家仁义思想角度深入分析,“亲”与分别可看作是“仁”与“义”的体现,“亲”体现着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情感,“清”意味着敬畏和遵守道德和法纪的底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古今中外的能人学者都对企业经营之德性有着深刻的领悟和全面的阐释,认为企业和经营者对商业伦理道德的切实遵循和商业目标动机的社会化实践,即企业德性资本的培育开发和有效利用,是企业自身发展和社会繁荣富强的重要精神内核,并基于此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价值指引和精神支撑,为中华民族复兴富强过程中企业经营水平的不断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动能^[9]。

5 结语

企业德性资本的培育和挖掘对于新时期企业生产经营水平的提升和社会经济发展动能的增强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具有以德治国的文化传统,亦有高道酬勤的社会理念。在借鉴古今中外德性资本理论及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开发并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性资本于企业生产经营之中,将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支持和质量保障。

参考文献

- [1] 章如庚.财富的资本来源于德性与智慧的积累[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166(8):33-34+36.
- [2] 谢玉进.试论企业道德资本的生成[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33(1):125-128.
- [3] 徐本华.论道德领导与企业道德资本[J].领导科学,2012,499(14):53-56.
- [4] 金军哲.道德资本:管理者应当积蓄的财富[J].中外企业文化,2008,276(2):67.
- [5] 中国国家历史.让牛顿崩溃的经济危机,1720年英国南海泡沫事件[EB/OL].https://www.sohu.com/a/259075480_486911,2018-10-12/2021-11-13.
- [6] 鲍勇剑.华尔街流行“德性资本主义”[EB/OL].<http://biz.163.com/06/0730/13/2N9J9A0B00020QDS.html>,2006-07-30/2021-11-13.
- [7] 靳凤林,冯磊.英国资本主义宪政制度与三大阶层的德性特质[J].科学社会主义,2020,196(4):157-161.
- [8] 鲍宗豪.企业道德资本与和谐社会建设[J].开放导报,2007,135(6):73-75.
- [9] 杨育谋.“道德资本”打造竞争力[J].经营管理者,2006(6):28-29.